

村上春树作品精选集

全译本

开往中国 的慢船

〔日本〕村上春树 著

雪蕨 译



漓江出版社

全译本

开往中国 ……的慢船

〔日本〕村上春树 著

雪蕨 译



漓江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开往中国的慢船/(日)村上春树著;雪蕪译.桂林:漓江出版社,2001.4

(村上春树作品精选集)

ISBN 7-5407-6453-8

I.开… II.①村…②雪… III.长篇小说-日本-现代 IV.1891.4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62687 号

桂图登字:20-2000-68 号

开往中国的慢船

[日本]村上春树 著

雪蕪 译

*

漓江出版社出版

(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159-1 号)

邮政编码:541002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

广西地质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1 字数 280 千字

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407-6453-8/Z·846

定价:18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



目 录

开往中国的慢船 (3)

电 视 人 (27)

飞 机 (52)

我们那个时代的民间传说 (62)

加纳克里特 (88)

僵 尸 (95)

睡 (100)

萤火虫 (138)

烧掉柴房 (160)

跳舞的小矮人 (178)

听风的歌 (199)



开往中国的慢船



开往中国的慢船

开往中国的慢船
想载着你同行
船是租来的
只有我俩同行……

——老歌

(1)

我第一次遇见中国人,那是什么时候的事?

这篇文章,就从所谓考古学式的疑问出发。各种出土品上贴着各式标签,分门另类地进行分析。

话说第一次遇见中国人,是什么时候的事呢?

一九五九年,或一九六〇年是我的推定。哪一年都可以,哪一年都没有什么大差别。正确地说,是完全没有差别。对我来说,一九五九年或一九六〇年,就好比一对穿着不起眼衣服的双胞胎穷兄弟。就算能穿过时光隧道回到那个时代,相信要区别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〇年,对我也会是相当辛苦的。

虽然如此,我还是很有耐心地继续我的作业。坚硬的洞穴愈挖愈宽,新的出土品虽然不多,却也开始现出它的姿





态了。

对了,那年正是约翰逊和巴达逊争夺重量级拳击冠军的一年。这么说,到图书馆去翻翻旧的新闻年鉴体育版就行了。这应该可以解决一切。

第二天早晨,我骑着自行车到附近的区立图书馆去。

图书馆大门旁边,不知怎么会有鸡笼子。鸡笼子里五只鸡正吃着略迟的早餐,或略早的午餐。天气非常好,因此我在进图书馆之前,先在鸡笼旁边的石台阶上坐下,决定抽一根烟,并且一面抽烟,一面望着鸡吃饲料的样子。那些鸡非常忙碌地啄食着饲料箱,它们实在是太急躁了,那用餐的景象,简直就像早期格数较少的快动作的新闻影片。

抽完那根香烟,我体内确实有了什么变化。不知道为什么?可是就在不知为什么的情况下,新的我隔着五只鸡和一根香烟的距离,向我自己提出两个疑问。

第一个问题是:到底谁会对我第一次遇见中国人的正确日期感兴趣?

另一个问题是:在日照充足的阅览室桌上放着的旧新闻年鉴和我之间,除此之外,还有什么彼此能分享的东西存在呢?

很正当的疑问。我在鸡笼前面又抽了一根烟,然后骑着自行车与图书馆和鸡告别。因此,天上的飞鸟没有名字,我那记忆也没有日期。

本来,我太多的记忆都没有日期。我的记忆力非常不确实。因为实在太不确实了,我往往觉得我在拿这不确实向谁证明什么似的。但是到底要证明什么?我也不清楚。大概要正确把握不确实的东西所证明的事,本来就不可能吧?



总而言之,我的记忆,就是像这样非常地含糊不清。有时前后颠倒,有时事实与想象交错,有时我自己的眼睛和别人的眼睛混在一起。这种东西或许已经不该称为记忆了。透过我小学时代(战后民主主义那可笑而可悲的六年之间落日的每一天)能够正确而清晰地回忆起来的事,只有两件。一件是有关中国人的事,另一件事则是某个暑假下午举行的棒球比赛。在那场棒球比赛中,我是中坚手,在三局后半,发生脑震荡。当然我不会没有理由就突然发生脑震荡,我们球队那次比赛时,只能使用附近高中运动场的一个角落,这是那天我得脑震荡的主要原因。换句话说,我为了全速追捕中央高飞球时,迎面撞上了篮球架。

我醒来时躺在葡萄棚下的长椅上,天开始暗下来,水洒在乾燥的操场所发出的气味,和当枕头用的新手套的皮味最先扑进我的鼻子,接着是倦怠的偏头痛。我好像说了什么,自己也不记得,是陪着我的朋友,后来很不好意思地告诉我的。我大概是这样说的:没关系,只要拍掉灰尘还可以吃。

这种话是从哪里冒出来的,我现在还弄不清楚。也许是正在做梦吧?可能做一个正在搬运午餐面包时,从楼梯上滚下来的梦吧!除此之外,就没有任何能够从这句话联想起来的情景了。

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,现在那句话还常常在我的脑子里打转。

没关系,只在拍掉灰尘还可以吃。

然后那句话便停留在脑子里,使我想到所谓我这样一个人的存在,和所谓我这样一个人不得不经历的道路。然后试着想那种思考必然会到达的一点——死。死这件事,





至少对我来说,是一件非常茫然的作业。而且不知道为什么,死使我想起中国人。

(2)

港都的山坡上有一所中国人的小学(名字我完全忘了,因此以后为了方便起见,就称为中国人小学吧。称呼有些奇怪,请原谅)。我去那里,那是因为我被派参加一个模拟考试。考试的会场分为好几个地方,但我们学校只有我一个人被指定派去中国人小学。理由不太清楚,大概是行政上的错误吧。因为班上的同学,都被派到附近的会场去。

中国人小学?

我每提到一个人,不管是谁,就问他知不知道有关中国人小学的事。没有人知道任何事。如果说有,也只是知道那所中国人小学在离我们校区,坐电车要三十分钟的地方。当时的我,并不属于那种一个人坐电车到那里去的孩子。因此对我来说,那简直就等于世界尽头一样的地方。

世界尽头的中国人小学。

两星期后的星期天早晨,我怀着可怕的黯淡心情,削了一打新铅笔,按照指示把便当和拖鞋塞进塑胶书包里。虽然是一个天气晴朗,甚至有些太暖和的秋天里的星期天,我母亲还是给我穿上一件很厚的毛衣。我一个人搭上车,为了怕坐过站,一直站在车门前面,注意着外面的风景。

去中国人小学,不需要看准考证背后印的地图,只要跟着一群书包被拖鞋和便当盒涨满的小学生后面走,就行了。几十个、几百个小学生排着队,在很陡的斜坡道上,朝着同一个方向走。说奇妙也真是奇妙,他们既不在地上拍球,也



不会拉低年级的帽子，只是默默地走着。他们的姿势，使我想起不整齐的永久运动的东西。我一面走上斜坡，一面在厚毛衣下流着汗。

跟我模糊的想象正相反，中国人小学的外观，和我念的小学几乎没有什么不一样。甚至更整洁。阴暗的长廊，湿湿的霉臭的空气……这两星期来不由自主地在我脑中膨胀着的那种印象一点也看不到。穿过漂亮的铁门，被植物包围着的石砌道路便缓缓伸出弧形，长长地延伸进去。玄关正面有一方清澈的水池，在上午九时的太阳下反射着眩目的阳光。校舍旁种着成排的树木，一一挂着中文说明的牌子。有些我会读，有些我不会读。玄关对面有一个庭院似的、被校舍围起来的四方形运动场，在每个角落里，有个不知名的铜像、气象观测用的白色小箱子和铁棒等。

我遵照指示，在玄关脱掉鞋子，遵照指示进入教室。明亮的教室里，整齐地排列着四十张雅致的上翻型书桌，在每张桌上都用胶纸贴着写有准考证号码的纸片。我的座位是在窗子边最前面一排，也就是这教室里最小的号码。

黑板是崭新的深绿色，讲桌上摆着粉笔盒和花瓶，花瓶里插了一朵白菊花。一切都那么清洁，而且排列整齐。墙上的软木板上既没有贴图书，也没贴作文。大概是怕妨碍考生，特地取下来的吧。我在椅子上坐下，把铅笔盒垫板摆在桌上，手支着下巴，闭起眼睛。

监考官把试卷夹在腋下走进教室，是在大约十五分钟以后。他看来不会超过四十岁，左脚有点在地上拖得似的轻轻跛足，左手拿着一支看来像登山用的土产店卖的粗制滥造的的樱木手杖。他跛得太自然了，使得那手杖的粗糙特别醒目。四十个考生一看见监考官，或者应该说是一看



见试卷,就安静下来。

监考官走上讲台,先把整叠试卷放在桌上,然后发出咻的一声,把手杖摆在桌子旁边。然后他确认一下所有的座位都没有缺席后,乾咳一声,轻瞄一下手表。他好像要支持身体似的,把两只手支着讲桌的两端,脸朝正前方抬起,暂时望着天花板的角落。

沉默。

十五秒左右,那每一秒继续沉默着。紧张的小学生们屏息凝视着桌上的试卷。脚不好的监考官则一直盯着天花板的角落。他穿着浅灰色西装白衬衫,系着那种令人看过之后就会立刻忘记颜色和花样的领带。他把眼镜摘下来用手帕慢慢擦着两边的镜片,然后又戴上。

“本人负责监考本考场。”他说本人。“试卷发下去以后,请先盖在桌子上。绝对不可以朝上。绝对不可以朝上。两只手请好好放在膝盖上。等我说:好——才可以把试卷翻过来。时间到的十分钟前,我会说十分钟前。请再检查一遍,有没有什么不该有的错误。其次我说:好——就停止。再把试卷盖起来,两手放在膝盖上。知道了吗?”

沉默。

“姓名和准考证号码要最先写好,请各位不要忘记。”

沉默。

他再看了一次手表。

“现在,还有十分钟时间,在这时间里有一些话想跟各位讲一下。请大家放轻松。”

呼——有几起透气声。

“本人是这所小学的中国老师。”

对了,我就是这样认识第一位中国人的。





他看起来一点也不像中国人。不过,这也是理所当然的。因为我以前从来也没有遇见过中国人。

“在这间教室,”他继续说:“平常都是和各位同样年龄的中国学生,跟各位一样拼命地努力用功……正如各位所知道的,中国和日本说起来是两个相邻的国家。为了大家都能愉快地生活下去,相邻的国家不得不互相友好,对吗?”

沉默。

“当然我们两个国家之间,有些地方很像,也有些地方不像。有些方面互相了解,有些方面却互相不了解。这点只要各位想一想,你们的朋友不也是一样吗?不管多么要好的朋友,还是会有些不了解的地方。对吗?我们两个国之间也一样。不过只要努力,我们一定能变成好朋友,我这样相信。因此,我们要先互相尊敬对方。这是……第一步。”

沉默。

“例如,请各位想一想。如果各位的学校,有很多中国人的孩子来考试。就像各位现在来这里一样,现在各位的桌椅上,正好有中国小孩坐着。请这样想一想。”

假定。

“星期一早晨,各位到学校去,走到自己的座位,结果怎么样呢?桌上到处刻着字,椅子上粘着香口胶,书桌里的拖鞋不见了一只。那么,你会觉得怎么样?”

沉默。

“例如你!”他真的就指着我。因为我的准考证号码最小。“你会很高兴吗?”

大家都看着我。

我脸涨得通红,一面慌忙摇摇头。





“你会尊敬中国人吗？”

我又摇了一次头。

“所以，”他重新面向正面。大家的眼睛，也总算又转回书桌的方向。“各位也不能在书桌上刻字，或把香口胶粘在椅子上，或乱翻书桌里面的东西。知道了吗？”

沉默。

“中国学生都会更清楚地回答噢。”

“知道了。”四十个小学生一起回答。不，三十九个。我已经连嘴都张不开了。

“好！请各位抬头挺胸。”

我们抬起头挺起胸。

“然后拿出信心来。”

二十年前的考试，结果如何现在已经完全忘记了。我所能想得起来的，只有走在斜坡路上小学生的姿态，和那位中国老师的事。

然后过了六年或七年，高中三年级时的秋天，正好同样舒服的星期日下午，我和一个同班女生走在同一条斜坡路上。我正暗恋着她，她对我怎么想我可不知道。总之那是我们第一次约会，两个人从图书馆回来的路上。我们先走进斜坡路正中间一带路旁的吃茶店，喝咖啡。然后我跟她提到那所中国人小学的事。我说完后她吃吃地笑起来。

“好奇怪哟。”她说。“我也在同一天，在同一个试场考试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真的啊。”她一面把奶精注入薄薄的咖啡杯边缘一面说。“不过好像是不同一间教室。我没听到那样的演讲。”

她拿起咖啡匙，搅拌了几次。



“监考的老师是中国人吗？”

她摇摇头。“我不记得了。因为没想到这种事啊。”

“你有没有刻字？”

“刻字？”

“在桌上啊。”

她嘴唇还一直碰着杯子边缘，想了一下说。

“嗯，到底有没有？记不得了。”她说着一笑。“那是好久以前的事了。”

“可是，桌子亮亮的好干净啊。不记得了吗？”我问。

“嗯，对，好像是噢。”她似乎不太有兴趣地说。

“怎么说呢？整个教室有一种感觉非常光滑的味道。我没办法形容得恰当，不过真的好像有一层薄纱笼罩着似的，而且……”说着，我右手拿着咖啡匙的把柄，想了一想。“还有，四十张书桌，全部都闪闪发光。黑板也是非常干净漂亮的深绿色噢。”

我们沉默了一会儿。

“你觉得没刻字吗？想不起来？”我又问了一次。

“嗯，真的想不起来了。”她一面笑一面说：“被你这样一说，好像也不见得没有，不过因为那么久了……”

也许她的说法比较正常。那么多年前，在什么地方方的桌上有没有刻字，谁还会记得？一方面是太久了，何况，也是可有可无的事。

送她到家以后，我在巴士上闭起眼睛，试着想象一个中国少年的姿态，一个发现自己桌上有人刻字的中国少年的姿态。

沉默。





(3)

高中因为是在一个港都念的,因此我周围有相当多的中国人。说是中国人,其实跟我们并没有什么特别不同,而他们也没有什么共同的明显特征。他们每一个人之间可以说千差万别,关于这一点,我们和他们都完全一样。我常常想,每个人的个体性真奇妙,是超越一切类别和一般理论的。

我们班上也有几个中国人。有成绩好的,也有成绩差的;有活泼外向的,也有沉默内向的;有住豪华住宅的,也有住采光不良、六叠榻榻米、一房一厨的公寓的。什么样的人都有。可是我并没有和他们之中的谁特别亲近。大体说来,我的个性并不属于碰到谁就跟谁亲近的那一型。不管对方是日本人、中国人,或什么人,都一样。

我跟他们之中的一个,大约在十年后偶然遇见了,不过这件事我稍后再提比较好。

舞台移到东京。

从顺序上来说——也就是除了不太亲近,没谈过多少话的中国同学之外——对我来说,第二个遇到的中国人,应该是大学二年级春天,在打工的地方认识的一个不大说话的大学女生。她跟我一样十九岁,个子小小的,仔细想来也不能说是不漂亮。我跟她在一起工作了三星期。

她工作得非常热心。我也被她感染而热心地工作,不过我从旁边看着她工作的样子,觉得我的热心和她的热心,本质上好像完全不同。也就是说,我的热心是“如果一定要做点什么的话,热心本身就是价值”这种意思的热心。而相



对的,她的热心是比较接近人性存在根本的那种东西。虽然我无法恰当地说明,不过她的热心里,似乎有一种她周围的一切日常性,全都靠那热心勉强支持着似的奇妙迫切感。因此大部分人都跟她的工作步调无法配合,中途都会生气起来,到最后能够不吵架而一直跟她一起作业的,只有我一个。

虽然这么说,我并没有特别跟她亲近。我跟她第一次像样地交谈,是在开始一起工作后一星期左右。她那天下午,大概有三十分钟,陷入一种恐慌状态。这是她第一次这样。一开始只是一点点错误,这在她脑子里渐渐扩大,终于变成无法挽回的巨大混乱。在那之间她一句话也没说,只是呆呆地站在那里。她那样子,使我想起夜晚的海上慢慢下沉的船。

我把一切作业停止,扶她坐在椅子上,把她握得紧紧的手指一根一根扳开,拿热咖啡给她喝。然后跟她说明没什么不得了的。不是根本上的错,就算错的地方从头再来一遍,也不会让工作延迟多少。喝了咖啡之后,她好像稍微镇定下来了。

“对不起。”她说。

“没关系。”我说。

然后我们闲聊了一下。她说她是中国人。

我们的工作场所,是一家小出版社阴暗而狭窄的仓库。工作简单而无聊。我接到传票,按照指示抱着几本书送到仓库入口。她把书用绳子绑起来,查对一下底账。其实只不过如此而已。再加上仓库里没有任何暖气设备,为了不被冻死,我们虽不愿意也不得不拼命忙着工作。

中午休息时间一到,我就到外面吃一顿温暖的午餐,在

